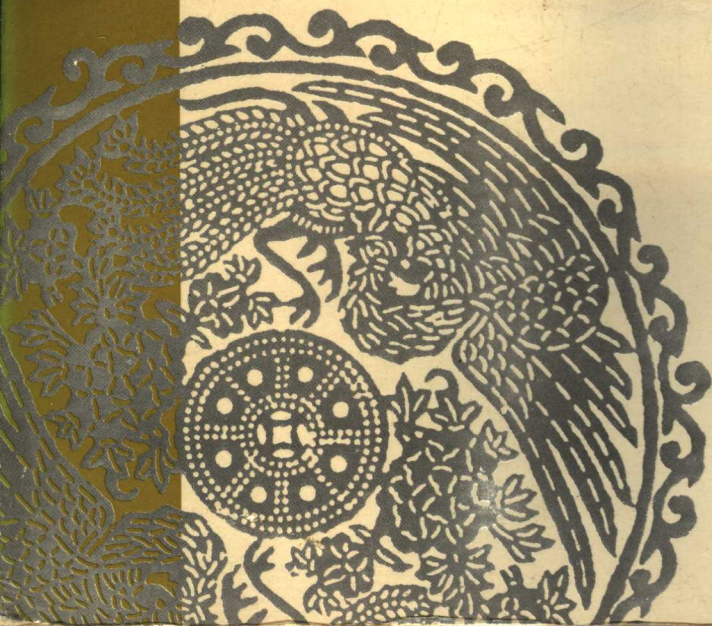


文學批評叢刊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

陳國球編



陳國球編

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

臺灣學刊書局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 陳國球編 -- 初版 -- 臺

北市：臺灣學生，民 80

30,687 面；21 公分 -- (文學批評叢刊；4)

ISBN 957-15-0227-8 (精裝) -- ISBN 957-15-0228-6 (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與批評

829.07

80001140

香港地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

(全一冊)

編者：陳

出版者：臺

發行人：丁

發行所：臺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88

電話：三六三六三三三三

FAX：三六三六三三三三

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湖

地址：永和成功路一段43巷5號

電話：九二八七一四

香港總經理：文

地址：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

電話：七九五九五五

定價：精裝新臺幣六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五五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初版

必究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227-8 (精裝)

ISBN 957-15-0228-6 (平裝)

82908

導言

陳國球

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地區古典文學批評研究概況

要檢閱香港的學術活動，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香港」一詞的範疇。本來最便捷的解決方法是只以香港土生土長的學人在香港發表的著述為據。但至少要加思索，就會發覺這種界定方法無論從學術人口或出版品的角度看都難愜人意。自清末開始，香港與中國之間存在着一種似斷似連的關係；有不少時候香港的學術文化對中國本土起着呼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長久以來不少中國內陸的學人因為種種原因要避地南來，在香港作或長或短的居停；他們對香港的學術研究往往有很直接的影響，有段時期甚至是香港學術界的主要力量。但若果我們將所有曾在港居停的學者都一一總攬，則「香港」的涵義又膨脹過甚；尤其近年來學術交流頻仍，年中大陸、台灣，以至國外學者來港訪問或客座講學的不在少數，把他們的學術成果都算到香港名下，就大有叨光之嫌了。再以學術著作的刊行而言，抗戰以前香港報刊已登載了不少國內學者的文章，近期如《大公報》、《藝林》等副刊的採稿方向，可說是這種風氣的延續。五、六十年代又有部分刊物在香港、台灣甚至南洋同時出版或發行，因此，以香港為基地的刊物所載就不盡是港人的著述。另一方面，因為嚴肅的學術刊物有限，不少香港學者的文稿都在港外（如台灣、大陸、日本等）刊登，單看香港的出版品是絕對不足夠的。（所以我們要盡量遍往的學

術成果，就要付出相當大的氣力。）由是觀之，上面舉出的「捷徑」並不可行，但要另尋一條大家都認可的「公式」卻也不容易。這裏只能暫時擬列下面兩點，作為討論的根據：

一、長期在香港居住的學者，其著述無論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發表的，都包括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二、曾在香港居停相當時間，後來移居其他地方，而著作在香港出版刊行的，亦在論述之列。當然，這樣的界限還未夠明確——例如多長的時日才算「長期」？「相當時間」實指幾年？——但太機械的切割似乎也不必要；執着這兩個指標，再透過下文的具體論述，大約就可顯出一個明晰的範疇。

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雖然不無學術活動^①，但具體成型，還是自五十年代開始。由於政治環境的變遷，不少學人相繼由大陸南下。他們移居香港後，部分繼續從事學術活動，創刊刊物雜誌、加入本地專上學術機構，或甚而開辦書院^②。而早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中文系，於一九五二年開設「文學批評」一科，由饒宗頤先生任教，這是香港專上學院設立此科的開始^③。到了六十年代，隨着中文大學正式成立^④，中國文學研究的質量都有所提升；普遍來說，高等學術機構的教與學的條件都有所改善，因此更易見出成績。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研究課程，雖然可追溯到戰前的四十年代，但在六十年代期間制度更加完備，包括有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等不同課程^⑤。中文大學也在六十年代中期開辦文學碩士課程；由一九六七年起，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畢業生。兩所大學加上其他專上院校的研究課程，在培育第二代以文學批評為專業的學者方面，貢獻不少；再者，這些課程都需要學生完成結業論文，其中以古典文學批評為

課題的，亦不在少數，裏面更不乏水準之作。這是我們回顧當日成績時所不能忽略的環節。

至於學術成果的刊佈方面，在五十年代期間，由於物質條件所限，純粹的學術刊物並不多見，有機會發表的文學批評的專論文章更寥若晨星。不過從現在能夠搜集得到的資料看來，也有幾個方向特別值得留意，這些方向一直到現在都還繼續發展，而六十年代的承傳之跡更加明顯，所以不妨合併討論。

首先是《文心雕龍》研究。一九五四年《民主評論》刊載了饒宗頤先生的《〈文心雕龍〉與佛教》一文；這篇文章揭示了饒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的一個方向。他後來也就此作過學術演講，再紀錄成文^①。一九六二年，在饒宗頤先生指導下，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出版了《文心雕龍專號》，裏面收集的論文和資料在以後的二十多年一直受到《文心雕龍》研究者的重視^②。除此以外，六十年代發表的《文心雕龍》著述也很多，專著如程兆熊先生的《文心雕龍講義》（一九六三），論文如李直方先生的《〈文心雕龍〉隨筆》（一九六一—六七），謝正光先生的《〈文心雕龍〉「詁體」釋義》（一九六三），黃孟駒先生的《王充〈論衡〉與劉勰〈文心雕龍〉》（一九六六—六七），江汝洛先生的《〈文心〉〈詩品〉對建安詩人批評之比較》（一九六七），石壘先生的《〈文心雕龍〉原道》（一九六七），鄧仕樑先生的《〈易〉與〈文心雕龍〉》（一九六九）等^③，中文大學碩士論文以《文心雕龍》為題的有兩篇，分別是石壘先生的《文心雕龍的本體論》（一九六七），古兆申先生的《劉勰的文學觀》（一九六九）^④。

這個時期文學批評研究的重點可說是六朝文論。除了《文心雕龍》研究之外，更有鄧中龍先生的《從陶潛、鮑照說到鍾嶸〈詩品〉》（一九六二）、黃兆顯先生的《〈詩品〉左思其源

出於公幹考釋V(一九六六)、陳炳良先生的《鍾嶸《詩品》指要》(一九六九)●,以及何士澤先生的碩士論文《詩品論疏》(一九六九,中文大學)都是同一專題的研究;陸機《文賦》的討論亦有饒宗頤《陸機《文賦》理論與音樂關係》(一九六一)●、林炳昌先生的《文賦研究》(一九六八,中文大學碩士論文)、陳恩良先生的《陸機文學之研究》(一九六八,香港大學碩士論文)等。研究《昭明文選》的則如黃兆傑先生的《從道德觀點論昭明文選》(一九六五,香港大學碩士論文)●。

另一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重點是清代的文學理論。一九五五年饒宗頤先生發表《人間詞話》平議V,對《人間詞話》的幾個觀念,如「隔」與「不隔」、「境界」、「造境」與「寫境」、「有我」與「無我」、「伸北宋黜南宋」等作出辨源和批駁。一九五八年王韶生先生又發表《彊村論詞》V,對朱孝臧的論詞見解作出歸納整理。這些討論都屬於晚清詞學的探索●。此外,黃肖玉先生有《顧亭林的文學理論》(一九五八)、何世權先生有《清代桐城文派之文學理論》(一九五八);而黃華表先生除了寫成《清代詞學》(一九五三)之外,也發表了有關桐城派理論的兩篇文章:《桐城詩派》(一九五八)、《桐城詩派道咸詩派詩案》(一九五九),又在新亞書院指導周啓慶先生完成《桐城派文論》的畢業論文●。

在往後的十年間,清代文學批評研究仍然少不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例如陳勝長先生的短論《讀〈人間詞話〉及〈詞學通論〉作詞法》(一九六七)、王韶生先生較完備的介紹《王國維文學批評著述疏論》(一九六八)都是明證。鄭士元先生的《常州派家法考》(一九六八)則是清代一個重要詞學派別的討論●。詩論方面,除了徐亮之先生的《漁洋詩與神韻說》(一九六一)之外,更重要的是劉若愚先生的《清代詩說論要》(一九六四);劉先生先在一

九五六年寫成《中國詩歌的三種境界》，套用王國維「境界」的概念，以探討傳統的中國詩學。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又有《中國詩學》出版。《清代詩說論要》一文則是劉先生對中國詩學理論研究的延續，也是後來另一本力作《中國文學理論》（一九七五）的先聲●。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也是當時學者注目的另一個專題。一九五六年先有吳天任先生的《元遺山論詩的特識》；六十年代又有王韶生先生的《元遺山論詩三十首箋釋》（一九六六）和陳湛銓先生的《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一九六八）●。後兩篇都是以傳統的箋疏方式對各首論詩詩逐一解說闡釋。

在此期間，還有一些論著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各個重點作出整理和介紹，如程兆熊先生的兩本專著《中國詩學》（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和《中國文論》（一九六四），以及何朋先生的長文《中國文學理論》（一九六〇、一九六三）都是●。縱論詞論發展的則有香港大學江潤勳先生的碩士論文《詞學評論史》（一九六三）●。劉百閔先生又就一個貫穿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觀念作出分析，寫成《中國文學上所謂「氣」的問題》（一九六三），而黃兆傑先生在赴英倫時又深入探討了另一個重要的批評術語——「情」，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文學批評中的「情」》（一九六九）。黃繼持先生則從觀念理論的角度勾畫出宋明理學與文藝思想的關係脈絡，寫成《「文與道」「情與性」——理學家之文藝思想試論》（一九六八）●。至於香港大學梁君儀先生的碩士論文《中晚唐詩論管窺》（一九六七）也是詩論史上一個段落的扼要述論。

從以上粗略的介紹看來，五、六十年代中香港地區的文學批評研究，視野並不寬闊。其中對《文心雕龍》以至六朝文學理論的重視，大概是民初學風的延續；劉師培、黃節、黃侃等國學大師對六朝文學的發揚，流風遠及，影響更不止於這時期的香港。至於清代尤其是晚清理論

研究興趣的萌生，或因時代相近，即使桐城派理論也與民初不少學人有血脈相連的關係，故此一如六朝文論的情況，成為論者的主要研究對象。當然，這些推斷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到了七十年代，由於歲月推移，學術人口劇增，六十年代受高等教育的人漸漸成熟，研究空間亦隨着學術發展不斷擴闊。然而《文心雕龍》研究仍然佔有一定的比例。例如潘重規先生在一九七〇年編校完成的《唐寫文心雕龍殘本會校》一書，成為後人研究《文心雕龍》唐寫本的重要根據。石壘先生除了將自己的碩士論文易名為《文心雕龍原道與佛道義疏證》（一九七一）出版外，又陸續寫成《劉勰論文學創作的心理活動過程》（一九七七）、《劉勰論作家的性情與才能》（一九七七）等長文，合成《文心雕龍與佛儒義理論集》（一九七七）一書；石先生以佛教名相、佛性理論為基礎來研究《文心雕龍》，雖然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贊同，但也自成一說，其鏗而不舍的精神，又值得敬佩。王韶生先生又有《文心雕龍》對於中國文論的影響》（一九七〇）一文，簡介《文心雕龍》的內容，並與後世批評家對相關的文學問題的看法作出比較。劉之仁先生有《文心》與《文賦》之關係》（一九七一）一文，黎活仁先生有《文心雕龍》事類》第三十八「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句析義》、《文心雕龍》原道》第一「無識之物」句析義》、《文心雕龍》的質文說與應璩文質論的關係》（一九七七）等文，都是就《文心雕龍》本身或與其他六朝文論關係的論析。至於綜論六朝文學意識的一個重要環節的有梁後養先生的《六朝文論中「新」之觀念》（一九七一）●；學位論文則有珠海書院韓堯森先生的碩士論文《劉勰修辭論研究》（一九七六）。

七十年代中有關文學批評的博碩士論文似乎出現了一種「重清」的傾向，而討論的範圍也不再局限於晚清詞學或者淵源於桐城的人物；例如一九七〇年香港大學碩士論文有楊松年先生

的《王夫之詩論系統探索》，一九七一年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有陳煒良先生的《王士禛於清代文學之地位及其詩論之探討》和江潤勳先生的《朱彝尊及其詞學》，一九七二年香港大學碩士論文有文世昌先生的《李漁戲劇理論的研究》，一九七三年香港大學碩士論文有車潔玲先生的《錢謙益的詩論》，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有蔣英豪先生的《論王國維文學》，一九七四年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有楊松年先生的《詩論史辨惑——整理明末清初詩論史之我見》，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有李銳清先生的《王漁洋神韻說之探討》，一九七七年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有湯友誠先生的《章太炎的文學思想》，一九七八年香港大學碩士論文有彭國強先生的《袁枚的詩論》。

在學位論文以外，有關清代的著述亦不少；例如一九七二年有周啓廣先生的《桐城派文論》、王韶生先生的《姚鼐文學批評論述評》，一九七五年車潔玲先生與楊松年先生也分別發表了《錢謙益論詩》和《論船山詩論》，有關《人間詞話》的研究，則有黃維樑先生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王國維境界說有沒有開創新境界？——《人間詞話》新論》，徐復觀先生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試評》；蔣英豪先生亦在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由其碩士論文整理而成的專書《王國維文學及文學批評》。另外蘇文耀先生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沈德潛所著詩話的箋釋研究《說詩碎語詮評》，黃兆傑先生的《王夫之文學理論中的情與景》也在同年刊佈。總之，無論由明末清初的錢謙益、王夫之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由桐城文論到神韻、性靈、格調諸種詩說，都有研究討論。

再依研究內容的時序作勘查，七十年代論著的探討主題還有屬於先秦時期者，如馬幼垣先生的《文學批評家的孔子——與古希臘學者的比較》（一九七〇）、胡應湖先生的《周孔詩教及其對後世之影響》（一九七一，中文大學碩士論文），屬於唐代者如黃振鋒先生的《初唐經

學家及史學家之文論》（一九七七，中文大學碩士論文）、鄭佩芳先生的《唐代詩人評唐詩之研究》（一九七三，中文大學碩士論文）、王晉江先生的《文鏡秘府論探源》（一九七八，中文大學碩士論文），以及何沛雄先生的《柳宗元的爲文理論》（一九七五），宋代如張秉權先生的《從黃山谷的交游看其文學觀的形成》（一九七五，中文大學碩士論文）、程兆熊先生的《論邵康節的首尾吟及其詩學》（一九七〇）、胡國賢先生的《朱熹詩集傳詩論初析》（一九七二，香港大學碩士論文）、張志誠先生的《朱熹的文學論》（一九七六，珠海書院碩士論文）、鄧仕樑先生的《滄浪詩話》試論》（一九七一），明代如黃兆傑先生的《四溟詩話》新論》（一九七一—七二）、顏婉雲先生的《王世貞藝苑卮言詩論析論》（一九七六，香港大學碩士論文）、黃繼持先生的《泰州學派對文學思想之影響》（一九七三）、林章新先生的《袁中郎及其文學》（一九七一，中文大學碩士論文）、許芷亮先生的《袁宏道和他的文學理論》（一九七七，香港大學碩士論文）●。

至於對中國文學批評作出綜合性討論而能特豎一幟的是黃維樑先生，一九七六年他在美國完成了《中國印象式批評——詩話傳統的探究》，對中國文學批評尤其實際批評部分作出系統的辨析，同年又寫成其論文的副產品《中國歷代詩話詞話和印象式批評》，以及《論情景交融》、《中國詩學上的言外之意說》等文，一九七八至七九年又以中英文正式發表其博士論文的其中一章《詩話詞話中摘句爲評的手法——兼論對偶句和安諾德的「試金石」》。這一系列的論文都有其特色，不容後來者忽視。

八十年代的情況可說是七十年代的進一步發展。以研究專題而言，仍然以《文心雕龍》佔量最多。其中又以陳耀南先生成績最豐，例如一九八〇年有《原「原道」》，一九八三年有

△《文心雕龍》△原道▽衆說平議▽，一九八五年有△《周易》△繫辭▽與△《文心》△原道▽▽、△《文心》△神思▽衆譯商榷▽、△《文鏡》△與△《文心》——劉勰與空海文學理論之若干比較▽，一九八六年有△《文心》△神思▽篇新譯▽，一九八七年有△《史通》△與△《文心》△之文論比較▽、△《文心雕龍》△的邏輯運用▽，一九八八年有△《文心》△風骨▽群說辨疑▽等●。另外饒宗頤先生在一九八五年除發表△元至正本△《文心雕龍》跋▽之外，還撰有△《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論「四聲說」與悉曇之關係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諸問題▽，一九八八年又撰成△《文心》△與△阿毗曇心》▽一文；可見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饒先生對△《文心雕龍》△的研究興趣不減●。黃維樑在一九八三年淡江大學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提交了一篇論文△《雕龍與美奩——劉勰與「新批評」的結構觀札記》▽，比較劉勰和英美新批評學派的理論異同，文章後來在一九八四年刊出；兩年後，中文大學又有一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劉勰的碩士論文，作者是梁明珠先生，題目是△《劉勰與柯立律治的「有機美學」》△（一九八六）。對△《文心雕龍》△與前代社會思潮的關係作出探討的有古兆申先生的△才性之學對劉勰及其前代文論家的影響▽（一九八五），就個別篇章作剖析的有羅思美先生的△論△《文心雕龍》△原道▽之「道」▽（一九八四），和鄭健行先生的△《文心雕龍》△明詩▽偶拾▽（一九八四）●。這些文章部分從比較或溯源的角度討論△《文心雕龍》△與其他文學批評論著和理論思潮的關係或異同，部分就全書的理論體系作全面的分析，部分着眼於其重要的篇章，提出細緻的討論；各篇論著所展示出來的研究方法和態度，可說是八十年代古典文學批評研究多元化發展的反映。

至於其他有關六朝文學理論的研究文章，如鄧仕樑先生的△釋「放蕩」——兼論六朝文風▽

(一九八三)、△蕭子顯的文論▽(一九八七)，徐復觀先生的△陸機《文賦》疏釋初稿▽(一九八〇)、黃兆傑先生的△《文選序》與蕭統的文學觀念▽(一九八五)等，都有其獨特的新見。何廣棧先生又爲《詩品》編成△鍾嶸《詩品》研究論文目錄▽(一九八〇)、△中日歷代書目有鍾嶸《詩品》之著錄▽(一九八五)兩篇目錄●。學位論文方面則有中文大學的碩士論文兩篇，分別是劉慶華的《沈約研究》(一九八一)和何成邦的《陸機文學論稿》(一九八四)。

於唐代方面，頗受近人注視的兩個詩論家皎然和司空圖都有文章討論。一九八〇年徐復觀先生發表了△皎然《詩式》「明作用」試釋▽一文，對《詩式》的一個論點提出新的見解；一九八七年羅思美先生發表了△司空圖詩論發微▽，綜合討論司空圖的詩學理論及其義蘊；一九八七年陳國球在爲《經典》叢書版《二十四詩品》所撰寫的導言中，從「後設詩歌」的角度提出一種詮釋《詩品》的方法，另外他還編寫了一篇△司空圖詩論研究著目錄▽●。

這時期探討宋金元文學批評的論述，在數量上比其他專題範圍稍有不及，可以見到的有王晉光先生的△王安石詩學觀評議▽(一九八三)，陳德錦先生的《南宋詩學創作論研究》(一九八五，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鄧昭祺先生的《元好問論詩絕句研究》(一九八四，香港大學博士論文)●。

相對來說，明代文學批評的討論比前有較大的增益。學位論文方面有四篇，分別是：顏婉雲先生的《明前後七子詩論析評》(一九八二，香港大學博士論文)，陳國球的《胡應麟詩論研究》(一九八三，香港大學碩士論文)、《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一九八八，香港大學博士論文)，彭健威先生的《明代竟陵派研究》(一九八四，香港大學碩士論文)。

正式發表的文章則有顏婉雲先生的〈王世貞悔作《卮言》說辨〉（一九八一）、〈明清兩朝有關前七子生平文獻目錄〉（一九八四）、〈明清兩朝有關後七子生平文獻目錄〉（一九八五）；林章新先生的〈論袁中郎文學〉（一九八四）；陳國球有討論胡應麟的幾篇文章：〈悟與法——胡應麟的詩學實踐論〉（一九八三）、〈變中求不變——論胡應麟對詩史的詮釋〉（一九八四）、〈《詩藪》與胡應麟詩論〉（一九八四）、〈「興象風神」析義〉（一九八四）、〈胡應麟的詩體論〉（一九八五）、〈胡應麟的辨體批評〉（一九八六）等；又有〈懷麓堂詩話〉論杜甫（一九八六）、〈試論唐代七律於明復古詩論的「正典化過程」〉（一九八七）、〈「宋人主理」——明復古派反宋詩的原因〉等篇。

有關清代批評的研究仍然保持一定的數量。黃兆傑先生在香港大學講授葉燮和王夫之的詩論多年，近年除了指導潘漢光先生完成碩士論文〈葉燮詩論鈎沈〉（一九八八）之外，還撰寫了〈葉燮《汪文摘謬》平議〉（一九八七），並將《薑齋詩話》的重要部分英譯（一九八七）。與王夫之同屬明朝遺逸的屈大均，向來不是文學批評研究的熱門話題，但最近有黃文寬先生寫了〈屈翁山的文學思想〉（一九八六）一文。至於葉燮弟子沈德潛的詩學理論則有李銳清先生的研究〈沈德潛「格調說」的來源及理論〉（一九八五）。於趙執信的詩話，就有饒宗頤先生的〈《談龍錄》跋〉（一九八五）一篇。晚清的王國維詞論有周天平先生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寫成的碩士論文〈異宇與境界——文學藝術的內在世界觀念初探〉（一九八三）。此外，陳耀南先生又有〈憑詩傳國恨、因話戲時風——《射鷹樓詩話》的別開生面〉（一九八五），分別從文化脈絡與時代意識的層面揭示有關論說的意義。小說理論的研究向不多見，這時期也有程張迎先生的〈論金聖歎評點《水滸傳》的小說理論〉（一九八三）一文，介紹金聖歎的評點式

批評方法 ●

在八十年代中另一項值得重視的學術工作是黃兆傑在一九八三年完成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英譯）》一書；這本書把《毛詩序》到《文選序》十三篇古代文學批評的文獻譯成英文，相信有助於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學理論的認識。至如陳國球的《論「鏡花水月」——一個詩論象喻的考析》（一九八四），專論一個詩論中常見的象喻，余汝豐的《〈世說〉〈詩評〉〈詩品〉——中國傳統文藝鑒評修辭舉隅》（一九八七），類分傳統實際批評的用語等，都可供學者作進一步討論的參考 ●。

比起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研究的涵蓋面廣泛得多。這當然與學術文章產量倍增，而學者又注意開闢研究範圍有關。不過，我們也會發覺到部分重要的課題還未得到適當的照應，例如先秦諸子的文藝思想，漢代班馬、王充以至辭賦家的文學批評，都沒有充分的討論；即如影響深遠的江西派詩論、《滄浪詩話》都只有極少數學者以之為討論對象；元代文學批評更問津乏人，小說戲曲理論的研究亦非常寂寞。再者，近四十年來未曾有人嘗試寫過一部文學批評史；唯一稱史的《詞學評論史稿》，實在不過是個詞論家的短論，依時序彙成一編，談不上通盤的策略或者史識。這些缺口的形成，當然也有其客觀的因素。在香港，基本上所有文學批評都是個別學者的自發行動，少有集團的整體推動，大規模的研究計劃自難進行，而且出版界的支援也小，學術書籍在本地印行的機會不多；更甚的是，香港公私圖書館藏有的文獻原典可說極度貧乏，選題研究難以從心所欲；學者除了依仗易見的新印古籍之外，就只能自行設法往外地借閱或影印。諸如此類的制約因素，都對香港的文學批評研究造成不同程度的限

制。當然在資訊流通方面，香港在近十多年來可說佔了地利，大陸和台灣學者以至西方漢學家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都不難搜羅，但二手資料的充裕也會有一個反效果，就是情性容易養成，部分研究者的作業或有承襲依賴，欠缺獨創精神，尤其某些論文不講規格，引書不提版本，不問卷頁，更有利於輾轉借用，有時更會衍生不必要的謬誤。不過這些陋習也不能說是香港獨有，而且以往的學術論著也不乏嚴謹之作，故此在回顧這些年來的概況時，既要看到以往的缺失，也要欣幸其中的成績。

另一方面，正如上述，香港的文學批評研究基本上是自發的，個別的學院式活動，其溝通網絡只懸置於純學術的層面，少受社會思潮的正面衝擊。與同期中國大陸學者所面對的干擾和控制相較，香港的學者可算處於免疫區，即或有言論寄望於「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對學術研究新向起催化之力^①，但這一類想法是香港的學術文章所難多見的。不過這一種迴避現實，自甘於象牙塔內的學術活動，又因為沒有扣緊時代脈膊，與其他文化活動脫離交涉，又變成一個重要的缺憾。

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觀察的角度，單就學術活動本身來做考查，又會發覺以上概略介紹過的專籍和篇章實在展示了各種樣式的寫作形態。我們既可以見到《唐寫文心雕龍殘本會校》、《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等以湛深舊學為根柢的傳統學術工作，又會遇上如《姚鼐文學批評論述評》一類撮述精義為主的介紹文字；既有寓詮釋於語譯者如《文心》、《神思》、《篇新譯》，也有寓剖析於英譯者如《薑齋詩話》（英譯）；又有在綜述各家之餘更有建構一套完整理論的雄心的如《清代詩說論要》；對前人業績作彙集品析的有《文心》、《風骨》、《群說辨疑》，就一般的成說作翻案的有《王世貞悔作《卮言》說辨》，要求為某些批評家重新定位的有《人

間詞話》新論；又有討論一家的專書如《胡應麟詩論研究》，細析句義的短章如《文心雕龍》、《原道》、《第一「無識之物」句析義》；有以思想史的訓練來審思文論的如《「文與道」「情與性」》，有從語意學的角度來辨明詩學觀念的如《王夫之詩論系統探索》，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詮釋古典的如《雕龍與美瓊》。各式各樣的論述模式所載乘的，既有精美金玉，也夾雜大量泥沙灰沙石；水準參差，隊伍不齊，本來就是香港學術的特色，如何汰沙見金，則有待歷史帶動的意識洪川去作浪淘的工夫了。

上面試圖就過去四十年的學術活動作平面的勾畫，但囿於個人見聞和學識，所述難免有遺漏和誤斷；只望可以起到引玉的作用，並請識者多多匡正。

本編所選基本上以上文概述的範圍為限，而偏重較近期的論著。編選時由於考慮到入選論文主題的涵蓋面，專著抽選成篇的可能性，各種文章的代表性，以至出版地域種種因素，因而在編選策略上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正；部分編者認為極有卓見或者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論文，亦不一定能編入集中。具體地說，本編因為在台灣出版，為免重覆，曾在台灣正式刊行，或者早經編入台灣出版的論文選集內者，都不再收載。所選論文二十篇，半數選自香港出版的大學學報，另選自綜合性文藝雜誌的一篇，自專書節錄的三篇，提交本港學術會議的論文一篇，在港外發表的四篇；其中又有不少原屬學位論文，經作者潤飾後再作刊佈的。至於編內論文的作者，有屬於中國大陸成長，在五十年代前後南下香港的學者，如饒宗頤先生、黃孟駒先生、石壘先生等；有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於六、七十年代開始在香港專上學府任教的，如黃繼持先生、黃兆傑先生、鄧仕樑先生等；也有在八十年代完成高等學位，並開始發表學術著作的年